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表现形式和功能*

吴东英 秦秀白 吴柏基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考察和分析了当前香港报刊语言所呈现的口语化趋势。本研究课题采用的语料来自2000年至2002年香港的四家主要报纸(《明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东方日报》),语料的体裁包括广告和新闻报道。研究发现:当前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形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问-答”语对的广泛应用;(2)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运用;(3)粤语入文。文章还就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功用和价值做了详细的探讨。

关键词 语言变异 语体研究 报刊语言

1.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语体具有截然不同的语言特征、风格特征和交际策略;口语语体中行之有效的语言成分和表现风格在书面语体中并不奏效,反之亦然。然而,近年来,在香港学生的写作和香港的报刊语言中,都出现了口语化倾向,引起不少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卢丹怀等 1998;曾志雄 1998)。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香港的中文已趋贫瘠、衰败,质量恶化;书面语体濒临死亡,甚至会给香港的文明带来灭顶之灾。

然而,很少国内或香港的学者运用社会语言学或话语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审视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的社会交际功能以及各自所具备的优势,更缺乏对香港报刊书面语体中所呈现的口语化趋势进行认真而系统的考察。因此,本文尝试对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功能做一次认真、系统的分析,力求回答两个问题:(1)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哪些方面?(2)在香港特定的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下以及广告、新闻语篇的微观情景中,口语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交际功用和价值?

2. 文献检索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国外社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人文工作者对言语交际和大众传播的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对口语和书面语这两种基本的传播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多采用“二分法”集中讨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的区别性特征,普遍认为:口语语体的句子结构简单,书面语体的句子结构复杂(Akinnaso 1982);口语语体表意隐晦,书面语体表意明晰(DeVito 1966);口语语体的语篇结构可以杂乱无序,书面语体的语篇则讲求谋篇布局(Ochs 1979);口语交流时,交际情景对语义的制约非常明显,书面语交际则不像口语交际那样地依赖语境(Olson 1977);口语

* 此次调研的基金项目为:RGC Directly Allocated Research Grant, Hong Kong (# A-PD29):“Intertextuality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Media Discourses”。

语体具有“零散性”的特征，而书面语体则具有“完整性”特征(Stubbs 1980)；口语交际时，交际双方都尽量体现“参与”和“介入”意识，而用书面语交际时交际者则常努力体现“超脱性”(Chafe 1982)。

然而，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语言学家认识到：口语和书面语的划分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地从“说”和“写”这两种基本交际媒介角度来区分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解释语言在履行其社会功能时所呈现出的纷繁多变的情况。人类学家还从人类交际的历史角度阐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Goody and Watt 1963; Goody 1968, 1977; Ong 1971, 1977, 1982)。他们指出：人类的言语交际经历了从口语向书面语过渡的历史进程，收音机和电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言语交际的历史进入了“第二个口语交际阶段”，而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口语和书面语一直都是互补、互助且共同完善的。早在1982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R. T. Lakoff就深刻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继印刷技术高度发展之后，高科技电子技术在大众传媒得以广泛应用，人类的言语交际行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为的口语和书面语交融”的现象。一些口语交际策略广泛用于书面语交际之中，这在年轻一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实证研究，有些学者(Linn 1995; Horowitz 1995)还指出：在使用双语的地区或国度，说双语的人和跨文化意识强的人在表达其情感和民族(或种族)主体意识时，惯于使用本地语言和本民族口语中经常使用的交际策略。

近年来，研究大众传媒和媒体话语的学者也将其注意力转向媒体话语生成过程中出现的话语(语篇)体裁混合与交融的现象。比如，Fairclough(1995)发现：英国电视的“午夜特别节目”本来是政治新闻和评论节目，但在播送的政治话语中经常夹杂仿真对话和娱乐性表演。Fairclough认为，“传媒消费已发展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消遣活动，观众期望的是消遣、放松和娱乐；观看电视节目时，观众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消费者，而不是市民”(Fairclough 1995: 179)。

有关中文书面语体中夹杂口语语体特征的现象，也引起香港语言学界的重视。Lo和Wong(1990)发现，香港传媒中存在着“多语混杂”的状况，香港的“大报”(即内容较严肃的报纸)更倾向于使用书面语风格和书面语交际策略，而一些通俗报刊的语言则呈现出明显的口语化特征，其语体风格更接近香港粤语的口语风格。吴东英等人(Wu and Man 1997; 吴东英、许谦文 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报道娱乐界新闻时，香港的印刷媒体比内地报刊更具有口语化色彩，同时也使用更多的口语交际策略。但在阐述其成因时，多数学者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香港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运用口语语体风格或交际策略能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观众。然而，Snow(1994)则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粤语文化在香港的兴起说明香港人的“方言区域”意识正在增强，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把粤语看作是香港文化及其主体意识的象征。

不难看出，国外学者对英语书面语体的口语化以及不同语体重迭或混杂使用的情况作了不少的研究；然而，对汉语书面语体口语化和不同语体交叉混用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尽管国外学者(Fairclough 1995: 167)指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体裁的交叉和混杂——是当今话语实践的一大特点，但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仍很不够，还没能系统地阐述语篇混杂的

形式及其语义特征和社会功能。因此,本文尝试对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趋势做一次认真、系统的研究和分析:(1)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趋势究竟有哪些主要表现形式?(2)口语化的这些表现形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多种功能和意义?

3. 何谓“口语化”

区分口语和书面语要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言语交际的媒介/媒体和言语交际的表现风格。本文着重讨论的是香港报刊(印刷、书面媒体)语言的口语化表现风格。我们对“口语化”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 Raible(1996)的观点为依据的。Raible(1996)认为,不论是通过口语媒介还是通过书面语媒介所表现的“口语化”风格,都以其内容上的和语言上的“简洁”(simplicity)为主要特征,而朋友间的日常随意交谈或“闲聊”则是典型的“口语化”风格(Raible 1996: 20)。

近年来,学者们讨论香港书面语所出现的口语化倾向,往往只局限于对“粤语入文”现象的分析(于君明 1995, 1997; 汤志祥 2000)。然而,能够体现口语化风格的语言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在本文中,我们将应用话语分析学的最新发展,对香港报刊语言所出现的口语化倾向,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1)“问-答语对”(question-answer pairs)的使用。据话语分析家(Sacks *et al.* 1974; Stenstrom 1994)的理论和发现,“问-答语对”是口语交际中的典型话语结构单位。

(2)感叹词、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运用。据话语分析家们(Biber 1988; Chafe 1982; Fairclough 1995)的理论和发现,这类词语表示积极参与并富有感染力,充分体现了口语交际的感情色彩,易感染读者,使读者更易介入。

(3)香港粤语口语中特有的词语和句法的使用。这些粤语词语或句法是香港人在非正式场合(如朋友之间的“闲聊”)中经常使用的风格,具有典型的口语化特征。

本研究课题采用的语料来自 2000 年至 2002 年香港出版的四家主要报纸,即《明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尤以广告和新闻报道两种语篇体裁为主。

4.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表现形式

4.1 大量使用“问-答语对”

“‘问’与‘答’是会话结构的支柱”(Stenstrom 1994: 1),在香港的报刊、印刷媒体,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广告,都大量使用了“问-答语对”这种富于典型口语特征的结构。例如:出现在香港报刊广告的“问-答语对”有(下划线部分为粤语词语):

(1) a. 还要费时捕捉低位入市的好时机吗?

崭新「自动捞底」机制让您掌握入市低位,更定时定候有回报!

(道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DaoHengFund Management Ltd.)(《明报》2002 年 7 月 2 日)

b. 文件唔见,点算?

无论是报价单、定单、送货单、发票、收据、合同……等,都能透过有效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立即将文件电子化,方便日后搜寻使用。

(泛讯有限公司)(《星岛日报》2002 年 7 月 17 日)

c. 点解人人都争住要 TOUCH?

只因艺康 TOUCH 轻便相机系列

一触即影听晒你指挥。

(Nikon/ 艺康香港有限公司)(《苹果日报》2001 年 11 月 22 日)

d. 二百万海景楼●市区边处有?

月供万余元●海景在眼前

旭日豪庭/SUNRISE VILLA

(旭日豪庭/SUNRISE VILLA)(《东方日报》2001 年 11 月 20 日)

“问-答语对”的形式还常出现在香港的新闻报道。出现在娱乐新闻的有如例(2):

- (2) a. 问到丰丰与宝咏琴现时的关系如何?他笑笑口地说:「我而家已经打开__自己道门先,理想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做番朋友...」(《明报》2000 年 1 月 12 日)
- b. 至于 CCT 电讯公司给他的酬劳如何?华仔话:钱系商业秘密唔方便讲,而呢个网页会有广告,计划将广告赞助的费用作为慈善基金...(《星岛日报》2000 年 1 月 18 日)
- c. 问到 Eason 知不知好友霆锋与王菲复合?他即扮傻说:「边个阿菲呀,我净系识陈见飞(陈冠希胞姊)咋?,我唔识王菲,唔识谢霆锋。家呢鹬时候,梗系也都唔识啦!」(《苹果日报》2002 年 7 月 4 日)
- d. 问东东与前女友张柏芝昨日同日返港,有否在机场碰头?他说:「我?__见到面,不过我在车上听到? ? 电台访问,? 答得好大方呀!」(《东方日报》2002 年 7 月 2 日)

“问-答语对”形式出现在香港地区新闻的有如例(3):

- (3) a. 她当官数十年,可有遗憾?
她说:“我觉得很多事,
已经尽了本分,
都应该是问心无愧。”(《明报》2001 年 1 月 18 日)
- b. 成绩不好,早料到不能升读原校,只能以候补生身分,与同学阿欣一同入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的中专证书课程。当记者问她们上课念的是甚么,阿欣顿了一顿,嬉皮笑脸地答道:「《Monday》啦、《Teens》啦、《Yes》啦、《一本便利》啦……」(《星岛日报》2002 年 7 月 17 日)
- c. 问她有没有锦囊给候任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任太谦虚地说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她在环保上的知识比我深。」(《苹果日报》2002 年 6 月 26 日)
- d. 昨日由入境处调任到廉署的李少光,被问及国家主席江泽民要各主要官员服从特首,身为廉政专员会否担心工作受到干预,李表示,不论任何国籍及背景人士,即使是特首也不会讲情面,一切将依法办事,不会因某部分人影响,「放放手脚唔查」。(《东方日报》2002 年 7 月 3 日)

虽然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答语对”并不完全像日常交往中的问答行为那样“对称”,但使用问答语式谋篇布局、叙述事件或描写人物是当前香港新闻报道语体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充分体现了香港新闻报道语体的口语化倾向。

4.2 大量使用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

据语篇分析家(Biber 1988; Chafe 1982; Fairclough 1995)的理论和发现,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运用能充分体现口语交际的感情色彩,更容易感染读者,使读者更易积极介入并参与交际。

运用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实例在香港的报刊、印刷媒体俯拾即是。从前面 4.1 部分所列举的实例中,如例(1a)、(2c)、(2d),我们可以看到感叹号的使用;从例(1a)、(2c)、(2d)及(3b)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语气助词“吗、呀、啦、咋?”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我?”和第二人称代词“你”、“您”则分别出现在例(1a)、(1c)、(2a)、(2c)、(2d)、(3a)及(3c)中。我们再看下面这些实例:

(4) 感叹号的使用:

a. 独赢 1 百万

你会 High 成点?

至 High 百万富翁

无需抽奖, 得奖话易!

(新鸿基财务)

(《苹果日报》2001 年 11 月 21 日)

b. 至于有线主持每次都化大花面妆出场? 志伟续言:「今次有线可能想同观众打成一片, 所以个个主持鬼五马六, 但有鹬观众想净睇场波、有人分析, 志在睇波, 唔系嬉戏!」

(《明报》2002 年 6 月 30 日)

(5) 语气助词的使用:

a. 到底边个第一呢?

知道 SUNDAY 第二就够嘞,

如果讲你听边个第一,

我? 咪好㗎?

(Sunday)(《苹果日报》2000 年 1 月 12 日)

b. 问伊健有否被过电时? 他笑问:「落雨咩, 电? 呢件事, 导演仲赞阿 Sa 拍戏做足功课又认真。」(《星岛日报》2002 年 7 月 1 日)

(6) 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

a. 您得到的• 额外丰厚过人

我们比别人更厚待您• 送上额外基金单位

(信安• 强基金/ Principal)(《苹果日报》2001 年 11 月 18 日)

b. 有记者问梁锦松, 在其五年任期内, 联系汇率会否脱钩, 梁拒绝保证, 并说:「最弊你不知我任内」是多久, 可能明日已无得做, 不讲这个问题, 不讲这个问题。」

(《明报》2002 年 6 月 27 日)

从研究的新闻报道语料中, 我们看到: 感叹词、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常常出现在新闻的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中。不论是在“硬新闻”如地区新闻, 还是“软新闻”如娱乐新闻, 我们都可以发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广泛运用, 而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就常常出现在引语之中。

4.3 大量使用香港粤语口语中特有的词语和句法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粤语入文”。粤语是香港公众经常使用的语言, 特别是在非正式场合, 如朋友之间的“闲聊”。粤语拥有一些自己特有的词语和句法, 而这些特有的词语和句法常常被借入香港的报刊、印刷媒体中, 李家树、汤志祥等人(李家树等 2000; 汤志祥 2000)称其为“粤语入文”。

香港的新闻和广告撰稿人经常不太遵守标准现代汉语的语用常规, 在其文本中夹杂许多粤语口语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既涉及粤语词语的选用, 如例(1)至例(6)中的斜体部分, 也涉及到粤语语法规则的使用, 如:

(7) a. 问到丰丰与宝咏琴现时的关系如何? 他笑笑口地说:「我而家已经打开自己道门先, 理想来说我希望可以做番朋友...」(《明报》2000 年 1 月 12 日)

b.故宁愿摆支表出来拍卖

都好过卖泳衣;(《东方日报》2000 年 1 月 8 日)

例(7a)中的“打开 自己道门先”相当于标准汉语书面语的“先打开了自己这扇门”；例(7b)中的“好过卖泳衣”相当于标准汉语书面语的“比卖泳衣好”。总之，熟知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法、语用习惯的人很容易在香港报刊上察觉到这种不同的语法、语用习惯。

5. 香港报刊语言口语化的功用与价值

下面让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剖析当前香港印刷媒体出现的口语化趋势。这里说的宏观角度，指的是香港社会文化、语言政策以及传媒技术发展的现状；微观角度指的是广告和新闻报道这类语篇在其生成过程中所面临的情景制约因素。

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趋势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渊源的，也是香港传媒在其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自鸦片战争至今 150 多年以来，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变迁使得香港的语言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沦为殖民地之初，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语。1858 年签定的《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邹嘉彦 1997）。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港府宣布：中文和英文都是官方语言。于是香港逐渐成为一个“两文三语”的社会。“两文”指英文和中文；“三语”指英语、国语（即普通话）和粤语。港人说粤语、写标准现代汉语，但又时常以粤语行文，即将粤语口语词语直接用于标准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之中；而香港中文教育界也常鼓励“我手写我口”，允许学生在用现代汉语写作时可以使用粤语方言词语（李家树等 2000）。香港这样的社会背景和语用现实，必然促使大众传媒在选择其表现手段和表现风格时必须不断地努力适应其社会文化特点和语用现实，必然对香港报刊语言所采取的口语化策略、口语化表现手段和表现风格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当代传媒手段广泛应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兼之广播和电视的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第二个口语时代”（Ong 1982）。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必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影响。就传媒领域而言，其“发展的趋势是对其宣传的对象更显随意，反对装腔作势，传媒策略更加灵活，讲求可行性，注重迎合和满足观众的口味和需求”（Tsang 2000，转引自 Tsui 2000）。此次调研中我们还发现：随着香港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也鉴于香港的特殊经济和文化地位，许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的“方言意识”日趋强烈，而传媒界人士为了开拓事业、赢得更多的观众、听众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同，冒着被指责为“格调低下”的危险而大量在印刷媒体中借用口语的语体风格和交际策略。

香港报刊语言的口语化也是受其新闻和广告语篇情景因素制约的结果。就广告而言，任何一则广告的产生都受特定时空因素的制约，广告的目的和功能是要在短短的时间或篇幅内，以种种引人注目的文字的和视觉的手段向读者传递商品信息，诱发人们的购买欲望，鼓动人们采取行动获取有关的商品或服务。因此，一则好的广告，其语言必须具有“推销能力”（selling power），应能使人产生强烈的购物欲望；必须具有“记忆价值”（memory value），应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公众能随时想起某种商品的长处和特点；必须引人注目，具有“注意价值”（attention value）和“可读性”（readability，Leech 1966；Vestergaard and Schroder

1985)。从前面介绍的广告实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广告语篇中出现的口语化特征和口语交际策略,如例(1)、(4a)、(5a)、(6a)等,能够提高广告的“注意价值”和“可读性”,并对公众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换言之,口语化特征能缩短传媒和公众之间的距离,引发公众的情感介入,借以更加广泛地实现广告的社会效益和语言的社会功能。

新闻报道的撰写也受其时空因素的制约。新闻报道的目的和功能是向读者传递最新信息,诱发读者的参与意识,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在上述新闻报道实例中领悟口语化特征的功用和价值。例(2)、(3)、(4b)、(5b)、(6b)以及例(7)中所出现的“问-答语对”、情感动词、语气助词以及粤语口语词语,在唤起读者的注意、增强新闻价值和可接受性方面均产生了良好的表达效果。“及时性”、“客观性”、“准确性”和“可信性”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基本原则(汤世英等 1986; Mencher 1996);我们观察到,在新闻报道中使用一些口语化特征和口语交际策略,能够进一步加强和体现这些新闻报道的原则,能够提高读者对某新闻“客观性”、“准确性”和“可信性”的信心。

6. 结论

本文考察并剖析了当前香港报刊语言中出现的口语化特征,重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问-答语对”的广泛应用,借以体现典型的日常会话结构;(2)感叹号、语气助词以及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的大量运用,借以感染读者,使读者更易积极介入并参与交际;(3)粤语口语词语、尤其是香港粤语特有的口语词语大量借用,借以体现香港公众在非正式场合(如朋友之间的“闲聊”)进行口语交际的风格色彩。

毋庸置疑,在当今香港的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领域,语言运用越来越朝着口语化方向发展。诸如“我手写我口”、“粤语入文”等语用原则和实践使得不少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担心教育质量和语言文化水平的下降,甚至将香港“中文水平的下降”归罪于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运用社会语言学观点全面审视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正如语言不能改变其产生之前的任何现实一样,言语交际的风格(含语体和文体风格)方面的变迁在语言变化的潜势尚不存在的情况下是难以发生的;语言只能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我们又凭借语言生活。事实上,在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社会里,人们已经不再像科学技术落后时代(如 Connery 1998 所描述的封建社会的中国)那样重视书面语的交际功能和交际价值了。现代科技的发展的确已经把我们带进“第二口语交际时代”,公众对运用口语方式进行社会交往的需求也变得更加敏感和迫切,在人际交往中也更加渴求直接面对听众、观众。因此,对于书面语体出现的口语化趋势,我们不必大惊小怪或感到遗憾,而应顺应语用习惯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予以正确引导,使其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不同语体的交叉和混用实际上是一种语域变异现象(deviation of register, Leech 1966),也是语篇体裁的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 Fairclough 1992)的表现。体裁互文性是指在同一个语篇内不同体裁或风格特征的混合交融,任何体裁的语篇都具有互文性,同时又能充当其它类别语篇的原型文本(pretext)。香港报刊语篇体裁互文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口语语体风格和书面语语体风格的交叉与混用。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不同语体的产生是社会文

化现实的需要，也是语言在行使其交际功能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同样的，不同语体的交叉和混用既是社会文化现实的需求，也是社会文化因素对语用实践制约的必然产物。作为社会语言学者，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进一步描写交际策略和言语风格的变化情况和趋势上，深刻解释变化的成因，把握其发展趋势，并通过分析语用习惯和表现风格给社会、文化以及教育事业可能带来的得与失，制定符合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语言政策。

参考文献

- Akinnaso, F. Niyi. 1982.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Language and Speech* 25: 97 – 125.
- Biber, Douglas.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fe, Wallace. 1982. Integr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speaking, writing, and oral literature. In Deborah Tannen, e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xploring Orality and Literacy*.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35– 54.
- Connery, Leigh Christopher. 1998.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DeVito, Joseph A. 1966. Psychogrammatical factors in oral and written discourse by skilled communicators. *Speech Monographs* 33: 73– 6.
- Fairclough, Norma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Goody, Jack.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77. *The Domestif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y, Jack and I. P. Watt. 1963.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ety* 5: 304– 45.
- Horowitz, Rosalind. 1995. Orality in literacy: The uses of speech in written language by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writers. In Donald L. Rubin, ed., *Composing Social Identity in Written Language*.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47– 74.
- Lakoff, Robin Tolmach. 1982. Some of my favorite writers are literate: The mingling of oral and literate strategies in written communication. In Deborah Tannen, e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xploring Orality and Literacy*. Norwood: Ablex. 239– 60.
- Leech, Geoffrey N. 1966. *English in Advertising*. London: Longman.
- Linn, Michael D. 1995. Stylistic variation in vernacular Black English and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composition. In Donald L. Rubin, ed., *Composing Social Identity in Written Language*.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33– 46.
- Lo, Terence and Colleen Wong. 1990. Polyglossia in the 'printed Cantonese' mass media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 1: 27– 43.
- Menger, Melvin. 1996. *Basic Media Writing*. Madison: WCB Brown and Benchmark.
- Ochs, Elinor. 1979. Planned and unplanned discourse. In Talmy Givon, ed., *Discourse and Syntax*. New York: Academic. 51– 80.
- Olson, David R. 1977. From utterance to text: The bias of language in speech and writ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7: 257– 81.
- Ong, Walter J. 1971. *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77. *Interface of the Wor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Routledge.
- Räble, Wolfgang. 1996. Orality and literacy: On their medial and conceptual aspects. In Dietrich Scheunemann,

- ed., *Orality, Literacy and Modern Media*. Columbia: Camden House. 17– 26.
- Sacks, Harvey, Emanuel Schegloff, and Gail Jefferson.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4: 696– 735.
- Snow, Donald. 1994. A short history of published Cantonese: What is a dialect literature?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4, 3: 127– 48.
- Stenstrom, Anna– Brita.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Spoken Interaction*. England: Longman.
- Stubbs, Michael. 1980. *Language and Literacy: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 Tsang, Kam ching. 2000. Quoted by Clarence Tsui in ‘Brash language that’s heard and now se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3, 2000.
- Vestergaard, T. and K. Schroder. 1985. *The Language of Advertis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u, Dongying and Hui, Him Man. 1997. Personage description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entertainment news discourse. *Text* 17, 4: 517– 42.
- 李家树、陈远止、谢耀基, 2000, 港式中文以粤语词入文评议。见单周尧、陆镜光主编《第七届国际粤语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288– 94 页。
- 卢丹怀、黄煜、俞旭, 1998, 试论香港报纸新闻报道的语言问题。《中国语文》第 1 期, 48– 55 页。
- 单周尧、陆镜光主编, 2000, 《方言》增刊《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汤世英、薄瀚培、劳沫之, 1986, 《新闻通讯写作》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汤志祥, 2000, 香港粤语词语口语化及其成因。见单周尧、陆镜光主编《第七届国际粤语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295– 306 页。
- 吴东英、许谦文, 2000, 方言变异还是语体变异? ——内地与香港娱乐新闻语篇范畴的差异分析。《中国语文》第 1 期, 35– 41 页。
- 于君明, 1995, “港式中文”的一斑。《语文建设通讯》第 47 期, 59– 62 页。
- , 1996, “港式中文”的形成原因及后果。见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等编, 《1997 与香港: 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 169– 74 页。
- 曾志雄, 1998, 大专学生汉语问题的一次考察。见《香港中国语文教学论文集》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151– 62 页。
- 邹嘉彦, 1997, “三言”、“两语”说香港。《中国语言学报》第 25 期, 290– 307 页。

作者通讯地址: 香港 九龙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Fang, Jingmin, The reference of third-person pronoun and its contextual constraints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aper examines contextual constraints of exophoric and anaphoric references of third-person pronoun in Mandarin Chinese. It argues, in general terms, that the use of third-person pronoun is always constrained by the information principle. More specifically, when used exophorically in introducing,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is only constrained by the information principle. When used exophorically in conver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onstrained by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Likewise, when used anaphorically, third-person pronoun is constrained by the functional principle. When used both anaphorically and exophorically, it is partially constrained by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plores fun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se of third-person pronoun,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ronoun systems.

Wu, Dongying, Qin, Xiubai and Wu, Boji (NG Pat-kei), Orality in Hong Kong Print Media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the societal and the generic constraints of the media genres have led to the use of orality in the Chinese print media of present-day Hong Kong. The data for the study are drawn from the four major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Ming Pao Daily News*, *Sing Tao Jih Pao*, *Apple Daily News*, and *Oriental Daily News* from 2000 to 2002, both the advertising and the news texts being included. Various forms of orality that are mingled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ritten media discourse are identified, and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these orality-oriented features or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Finally,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a dynamic approach towards language use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in a society.

Turner, Ken, A note on the Neo-Gricean foundations of societal pragmatics

Societal pragmaticists accuse (Neo-) Gricean pragmatics of ignoring socio-cultural factors, and of being ethnocentric. Attardo (1998) presents a useful and timely defence of Neo-Gricean pragmatics, but he shares with critics the mistaken belief that Grice was principally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of the design of a theory of conversation. Many criticisms of Gricean pragmatics in fact can be defused if it is remembered that it is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not sociological analysis, that underpins the Gricean inquiry.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one of the Gricean themes that has no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in the linguistics community that it deserves is his defence of material implication.